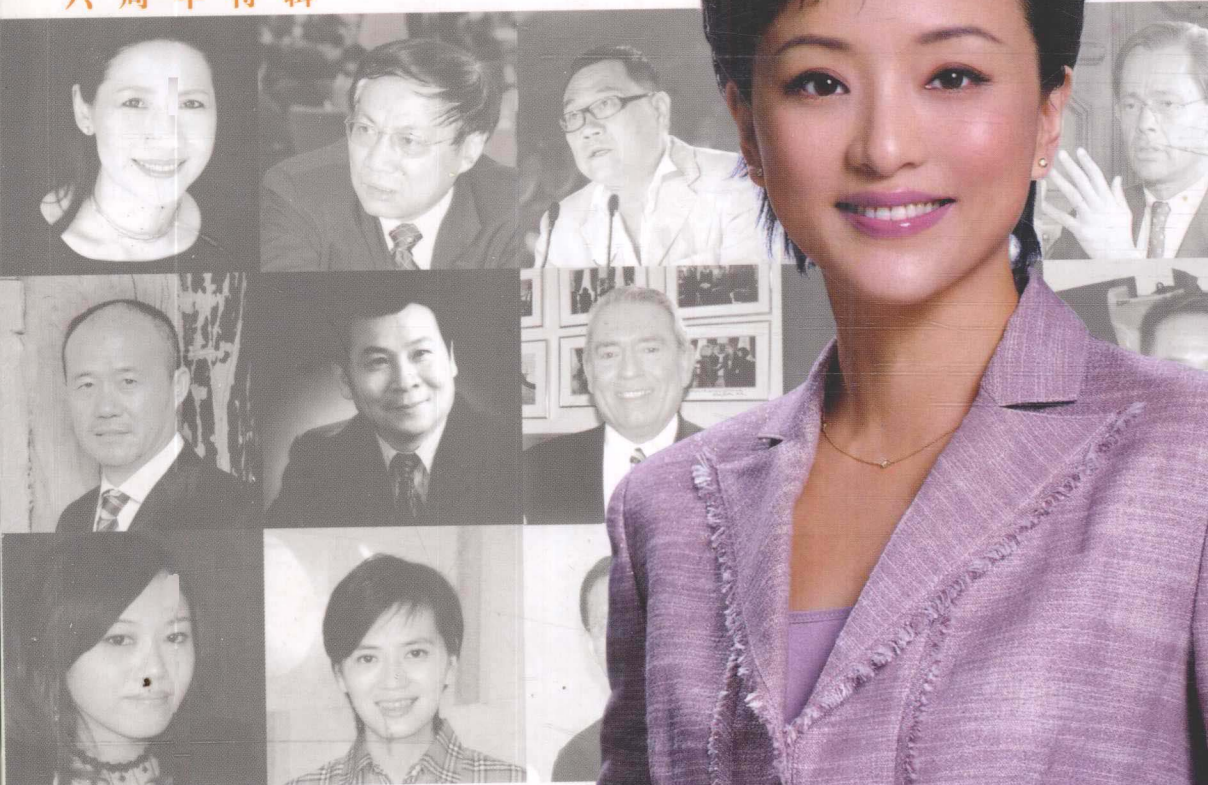


楊瀾訪談錄
YANG LAN ONE ON ONE
六周年特輯



让未来记住今天(下)

写给100年后的人们

杨澜 编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杨澜访谈录

YANG LAN ONE ON ONE

六周年特辑

让未来记住今天 (下)

杨澜 编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让未来记住今天(下): 杨澜访谈录6周年特辑 / 杨澜编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80225-478-7

I. 让… II. 杨… III. 名人—访问记—世界—现代 IV. K8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2955号

让未来记住今天(下): 杨澜访谈录6周年特辑

杨澜 编著

责任编辑: 许 彬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SIGIH-聂竞竹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8年6月第一版 2008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478-7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001	丹·拉瑟	听从新闻良知的呼唤
011	洪 瑛	“做得好的进医院，做得不好进法院”
011	沈 冰	“每一次选择都让我挠头。”
011	张悦然	“仅仅白头偕老不算幸福。”
029	黄奇帆	不必人人都有产权房
051	林怀民	天人合一的安静舞者
063	任志强	让每个人都有生存的余地
065	邵 忠	挖掘人生故事，又不等同于娱乐八卦
075	托马斯·米德尔霍夫	“如果不能打败它，就把它买下来吧。”
093	王海兵	为未来而工作
103	王全安	女人和电影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东西
115	王荣轩	“成都老百姓叫我‘王府南’。”
127	王 石	极限运动让我痴迷
151	武 韬	既不结盟也不对抗
161	王小慧	不做煮熟的青蛙
175	王侠军	玻璃艺术“风光”无限
189	徐永光	真诚的使命感为我疗伤
201	杨紫烨	为了所有被震撼被感动的东西
209	郑佳明	“是非自己来看，毁誉由别人去说。”
221	周梁淑怡	香港的“动力女性”



| 丹·拉瑟 / 听从新闻良知的呼唤

丹·拉瑟，1931年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1950年代开始进入新闻界。1963年，是他首先报道了刺杀肯尼迪事件，因在报道中保持了客观、冷静的态度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后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白宫记者，1981年取代王牌主持人克朗凯特，成为CBS晚间新闻节目主播。丹·拉瑟是美国新闻界的精英人物，1972年他曾经作为CBS记者跟随尼克松总统出访中国，成为第一批到中国访问的美国记者之一。

致我们重孙的孩子们：

很有意思吧，当我们写信给你们，生活在2107年的孩子们时，我们正高度关注你们拥有第一手资料而最先知道的将来。你们是否生活在一个因全球气候变化而改变的星球？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否找到办法解决相互牵制的能源和污染问题？人口统计的压力和对稀缺资源的剧烈竞争是否继续导致武装冲突，或者是否你们已经找到方法超越人类的血腥历史？

我们急切地寻求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而结果只有你们才能知道。你们是否表扬了我们已经做出的选择，或者你们是否，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诅咒我们愚蠢和目光短浅，诅咒我们的无能或者拒绝为你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计划？

回顾这一百年，我们经历了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我们看到了科技进步的飞跃，疾病被治愈，辛苦的工作变得轻松，宇宙的许多秘密被揭开；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环境因工业废物而遭到污染，恐怖的、能毁灭全人类的武器被开发。我们看到了农业的丰收，也目睹了饥荒。在被战争和种族屠杀破坏的一个世纪里，我们看到了人权的巨大进步。

我们好像一个受责骂的种族，挣扎在我们较好的自我和卑鄙的劣根性之间，徘徊在我们曾经极度扩张和正在萎靡的智慧之间。虽然这可以同样用来叙说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但是这里，21世纪的早期几年，这个速度已经加快了，并且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新闻记者的身份，赋予我机会看到更多的上一个世纪所发生的历史性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不仅仅是五十年。在读到我在这里写下的这些文字的时候，你也许会考虑到，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更多的是关注好新闻的报道而不是他们自己。当然，我们不是没有希望，或希望渺茫——证据在你们手中，因为不是乐观的姿态，不可能伸手触及将来。历史赋予我们知识，使我们重新恢复信心：这个星球已经远离黑暗的日子，但是仍需要坚持。

你们也会注意到我很少触及到现代的事情——对历史的清醒认识，也告诉我们，大部分的这些对你们并不重要，结果对你们也无所谓，即使一百年之后。

我能提供给你们的最高的就是一般性，以及仅仅从我个人所处的世界的一角——美国的角度出发：我们处在一个政治划分的时代，许多人认为国家正在走歧途；我们挣扎在一个变化着的地理政治蓝图上和无国界的恐怖主义的威胁中；我们生活在媒介轮番增长的时代，它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这片领土上仍然存在一个渴望，渴望更多有意义和不朽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诸如家庭和社会。

对于你们，我们的重孙的孩子们，我用所有父母的希望来结束我的信，我们将一定留给你们一个比我们现在所知的更美好的世界。

丹·拉瑟

2007年8月11日

杨 澜：从我现在所站的这个阳台望下去，正好可以看到世贸中心的原址，六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废墟的清理工作还没有结束，而实际上9·11恐怖袭击事件在美国公众的心理上所造成的巨大冲击还要持续更长的时间。在9·11之后，有人对美国的媒体提出了这样的质询，那就是媒体为什么没有让公众充分地了解到外界对于美国的仇视，提出这样质询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美国的传媒精英之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首席主播丹·拉瑟，他有着四五十年的新闻从业经验，曾经因为报道诸多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事件而引人瞩目，我在CBS纽约的总部采访了他。

杨 澜：2002年正好是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30周年纪念。当时，您作为CBS新闻频道驻白宫的通讯记者，跟随总统一起去了中国。后来我读到过一篇文章，文中引用CBS当时的新闻主播华特·克朗凯特先生的话说：“记者们哪儿去了？都观光去了。”您也是其中一员，对吗？

拉 瑟：在那次历史性的访问中，我们确实想游览很多地方。坦白地说，当你打算写一篇报道时，你都无法预想它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但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不同。每个美国人以及全世界的许多人都明白，由于早期历史的原因，那将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访问，因此，这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人们没有料到尼克松总统会这么做，这也是使这件事成为特大新闻的原因之一，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在创造历史。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走下飞机对一个美国通讯记者来说，就像是来到了另一个星

球，一个遥远的星球，我想所有的通讯记者都想，或者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知道时间将很快流逝，所以在我的双脚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我就要尽可能地努力工作，尽可能地多获取信息。

杨澜：当时的一切都是新闻是吗？每件事都很新鲜？

拉瑟：是的，每件事都很新鲜。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候，我是消息源记者小组的成员，代表其他记者在杭州等候总统的到来。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先生也在那里迎接他，而我碰巧就站在他旁边。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只是远远地见过他。就在我们等候尼克松总统的时候，我们无意中聊起了中国的教育问题，聊起了他对中国教育的希望和梦想以及他对尼克松访华将在短期内产生的效果的看法。这次交谈极大地改变了我对周恩来的看法，我以前从没意识到——也许我应该意识到，他的学识是那么渊博，他对学校和教育问题是那么热衷。那时候人人都知道毛泽东很睿智，但是周恩来的名声还没那么响，那次交谈不仅改变了我对周恩来的看法，在某些重要方面也改变了我对中国的看法。

杨澜：1997年您乘火车周游了中国，其中包括中国的内陆地区，有些地方很多美国人都没去过是吗，那次旅行您有什么新发现吗？

拉瑟：那次旅行太棒了，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次旅行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中国正在和时间赛跑，他们要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到内地，这一点和我们美国的历史有些相似。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曾试图开发内部地区，试图将它们带入工业革命和农业进步的新经济时代。因此在那次旅行中，我意识到中国正在和时间赛跑，而且有一些积极的因素表明，中国会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同时也有一些消极因素表明，在人口超过十三亿的中国这个任务是多么的艰巨。

杨澜：是的，昨天我住的饭店酒吧的服务员得知我是在香港工作的时候，他靠过来充满同情而又认真地说：“哦，那里的政治局势有多差！”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人对中国的一个普遍看法，在美国只要一提起中国，媒体的

报道总是集中在政治报道上，而且大多都是负面报道，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对于这个国家的总体看法就会失衡。

拉瑟：你的问题包含了很多内容，我尽量简单作答吧。第一，总的说来，美国人对中国了解不多，这其中有一部分责任在于报界、媒体，这一点我是不会为自己推脱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国，是一个情况十分复杂的国家，当然你可以说每个国家都很复杂，但是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你说得没错，美国的确对中国有成见，但是我去中国的时候，我说这话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从1972年起我就打算尽量每年去一次的，虽然我后来并没有做到，我发现中国对美国也有成见。那时候我真想告诉每个人说，他们的看法是不对的，当然我们现在谈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成见，而不是中国对美国的成见。这些观点和我们这些新闻界的从业人员，也不无关系，那么如何来消除这些成见呢？例如不要对问题过度概括。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大国里，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中国，中国和美国一样，也有地区差异，它每天、每星期、每个月都在发生变化，我不想离题太远，但是我也不能不提这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从我对中国的访问中，我知道中国有些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非常清楚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他们担心的是，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的那些问题，例如我们在价值观、社会道德观方面的不同，美国人民总的来说，在这些问题上至少和中国政府持不同观点。我想说明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成见有一部分是由于一些的确存在的问题所造成的，我们记者在世界各地采访时必须注意自己在报道中，不要带有任何成见，那是最容易犯的错误了。

丹·拉瑟相信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新闻。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他曾不顾生命危险在越南和阿富汗的战场进行现场报道。他性格中有非常强硬的一面，敢于挑战权威。他曾经顶着巨大压力，报道过“水门事件”；又曾经分别与尼克松和老

布什总统在公开场合发生交锋，对于外界的各种批评，他从不忍气吞声。

杨澜：从艾森豪威尔开始，您几乎采访了每一届总统，还和其中几个有过冲突，这些冲突有没有给您在 CBS 的工作带来过麻烦？有没有人对你说：“丹，下次不要这样，给我们省点儿麻烦吧。”

拉瑟：有，次数不多但的确有过。

杨澜：您不担心您的事业也许会因此被毁吗？

拉瑟：也担心过。当然作为一名前方记者而不是新闻主播时，当你面对的是一名位高权重的人物时，如果你企图越权或是向权威发出挑战的话，那可能会对您的事业有害。有时我的确会想，这回我的事业完蛋了，不过我不想让这种担心无限制地膨胀，我很幸运能在 CBS 工作，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的标准是最高的，以前是最高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也是最高的，现在依然是最高的。老实说，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我碰到过两次。

杨澜：一次是和尼克松。

拉瑟：是的，当时我想我的记者生涯也许就要结束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那次只是我们国家内部的问题，碰到一些麻烦也许是我活该吧。不过这一点也许应该由其他人来做出评判。我的第一次麻烦发生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任期内，你前面也提到过尼克松总统，他在中国问题上取得了突破，还有很多其他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最后提到这一点很令人遗憾，他却成了一个巨大的违法阴谋的领导人，这个阴谋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基础。作为一名驻白宫的记者，我只是努力想做一个诚实的信息发布者，这确实使我和尼克松总统之间发生了至少一次直接冲突，还有一次冲突是我和当时的副总统乔治·布什，也就是后来的布什总统之间发生的。他当时是打算竞选副总统，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但是他在公开场合所说的一些话和事实不符。作为一名记者，如果你想做一名好记者的话，有时候你必须问一些棘手的问题。

杨 澜：我还记得乔治·布什当时反驳了您。回想往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您是否还会像以前一样，还是会更谨慎些？

拉 瑟：实事求是地说，我并不感到遗憾。当然我并不希望面对当时各种各样的攻击，也不愿意处在当时那种尴尬的境地，但是我尽力了。我总是对自己说，至少我问了一个好问题。当时的副总统，也就是后来的总统布什，采用了一个政治技巧来回应我的问题，这个技巧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他所采用的技巧就是拒绝回答我的问题，以免遭到进一步的攻击，反过来还要让我来回答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有一点值得强调，那就是不上电视的记者，其实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这就是记者的工作。1988年那件事发生以前，还很少有人电视上问这样棘手的问题，这才是它当时备受关注的原因为。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并不值得我们这么去关注，记者向政客发难，政客拒绝回答并开始攻击记者，这其实是很寻常的事。在自由社会里，新闻界的这种短兵相接其实并不稀奇，可是这件事当时引起人们如此多的关注，这在我看来反倒是不寻常的。

杨 澜：两天前，我去了世贸大楼的废墟，它让我想起了那些在这次恐怖袭击中失去生命的人，也让我想起了您在9·11恐怖袭击后所说的话，您说可能美国媒体并没有充分地告诉美国人民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对美国的不满和怨恨，您为什么这么说呢，是什么妨碍媒体做出充分报道的呢？

拉 瑟：首先，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事实，是不言自明的。你问“是什么妨碍了媒体”，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花上几小时来谈，不过，总的来说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记者们自身缺乏对整个世界的了解，同样我也不会为自己开脱，这一点对那些没有出过国或是不太出国的记者来说尤为如此。第二，美国的新闻界有这样一种倾向，人们更关注国内的情况，对发生在自己国家的事要比发生在外国的事更感兴趣。二战刚结束时，情况还有所不同，但是美国新闻界，任何一位诚实的观察者都不能不注意到，近几年中，我们对国际问题的报道一直在减少，而不

是增加。另外，我还想说的是，我们的确没有充分报道伊斯兰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对本土美国人和海外美国人的憎恨，以及这种憎恨的程度。

杨 澜：您刚才提到“真相从不简单纯粹”，但是事实上，对于处在快节奏时代的电视观众而言，他们希望能看一些纯粹清楚的报道，前几天我采访了西蒙·托宾先生，他曾担任过《纽约时报》主编一职，他说电视报道的质量比不上报纸，因为电视报道追求轰动效应，它更像是主持人、明星、济济一堂的娱乐界，充满了眼泪、轰炸和暴力。您是否同意他的说法？这和您一直强调的新闻质量有关吗？

拉 瑟：我的看法是：这是所有美国记者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称之为新闻的“好莱坞化”，我承认这个问题在电视新闻中更为突出，但是不幸的是，它同样也影响到了美国的报界。

杨 澜：亚洲也是如此。

拉 瑟：这个问题和美国新闻业试图竭力吸引观众、听众和读者有关，虽然我觉得这种做法并不明智。新闻和娱乐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如今这种界限在电视上几乎消失了，这一点并不让人愉快，但它却是事实。近二十年来，随着光缆和卫星的应用，美国电视业的竞争范围日益扩大、日渐激烈，美国电视业渐渐远离了原先的价值取向。新闻竞争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很激烈，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此激烈的竞争最终导致了质量标准的全面下降，那么标准会低到什么程度？在开诚布公地和你谈了这些以后，我想说的是，9·11之后，我看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美国新闻界的一些人，尤其是美国电视业的一些从业人员，即使现在还没有完全回到我们以前基本原则的轨道上，至少他们都愿意重新向这些原则靠近。这一步我们才刚刚跨出，毕竟现在离9·11事件还不到一年，所以这只是一个初步的看法，但是我相信美国人、尤其是美国记者，都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一个自由独立、力求正义的新闻界的价值，套用一句外交辞令：我对此表示谨慎的乐观。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也许我们可以利用9·11的经历，重新评估我们

所做的一切，听从我们新闻良知的呼唤，而不只是被市场调查和收视率牵着鼻子走。

杨澜：您当了五十年的记者，在 CBS 还担任了二十年的主播，您是个名人，您的生活就好像放在一台巨大的显微镜下，任何一个错误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轻易不会得到别人原谅。相比做记者而言，您觉得主播的工作怎么样？您每天还是自己写内容提要吗？您日常的编辑和撰稿有多详细呢？

拉瑟：我喜欢当主播，我热爱我的工作。

杨澜：您是不是很迷恋您的工作？

拉瑟：还没有达到迷恋的程度吧，我可不是工作狂，我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但是我确实深爱着我的工作，我也很喜欢当主播。你问我是不是更喜欢做主播，我不会这么说，这也许是因为我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我热爱我所做的一切工作——为什么不呢？当记者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是我年轻时，常担心做记者能不能养活自己，现在我关心的不是谋生问题，而是工作质量问题了。我热爱我的工作，热爱极了，至于那些说我有偏见的指责，我的工作可以说明一切。我在工作以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也许很难使人信服，但是从我的工作中，人们可以做出判断。我的工作会告诉你，也许你可以相信别人对我的评价，但是你至少应该清楚地知道，我很重视我的工作，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工作中，力争做一个诚实的信息发布人。

9·11 之后，丹·拉瑟的办公室里也出现了含有炭疽菌的信封，他的秘书因此受到了感染，所幸没有酿成大碍，可见一个记者现在所要面临的危险不仅出现在战争的前线，也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而且他还要面对更多比如说收视率的压力、同行的竞争、公众的挑剔、权势人物的指责，所有这一切恐怕都不是在新闻学院里可以学到的。然而丹·拉瑟的应对方式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 LIVE WITH IT，把这些都当做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来接受。



目前国际上的几大会计师行，都是有百年历史的，我希望在一百年以后，能看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执业会计师也有了百年的历史，那样对我们是最好的告慰了。

中国解放前有这个行业，我的一个三伯父是中国的第一批执业会计师。解放以后恢复了这个专业，到现在为止，刚刚二十六年，我也恰好是这二十六年的见证人之一。这个行业可以说是非常严谨的，也是非常讲诚信的。它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同步的。按照我们的话说，这个专业应该是整个一个国家的经济的晴雨表。

我们中国的执业会计师，现在要和那些历史悠久的国际会计师行竞争。虽然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但是我们很有信心。我是唯一一个取得了出众权的中国执业会计师，所以我想，经过我们的努力，在一百年以后，肯定有中国人自己的百年老店的。

洪瑛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女性的尊严、健康、快乐和接受教育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些不仅关系到她们的个人命运，也关系到她们所承担的人类再生产的使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三位不同时期的新中国女性，由于生长环境和成长经历的不同，她们身为女性的感悟也呈现出丰富的层面。

洪 瑛：现在检讨起来，我们的婚姻爱情好像不是很多，多一半是感恩。

沈 冰：我可能会非常勇敢，但是在面对孩子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很胆小。

张悦然：我觉得好像身体里有更大的力量，但放不出来，所以想换一个男人的身体试试……

杨 澜：洪大姐，来上我们这个节目的每一个嘉宾都要从自己最喜欢的一张照片说起。您选择了什么样一张照片？

洪 瑛：这个是我选择的一张，我和我先生结婚三十年纪念日这一天。

杨 澜：2006年10月10号。

洪 瑛：对。我们是1976年10月10号结的婚。我跟我先生一起照的照片很少很少。我们两个都喜欢摄影，但是都是给对方照。我们合照的照片可能也就两三张。这束鲜花也有一些特别的意思，那天我们参加他一个堂弟的婚礼，新娘子扔过来给我的。按照西方的说法，可能我们应该再有一次婚礼，再一次的婚姻。

杨 澜：1976年的那场婚礼是什么样？